

◎ 虞云国 著

两宋

历史文化丛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虞云国
著

两宋

历史文化丛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宋历史文化丛稿/虞云国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09844 - 2

I. ①两… II. ①虞… III. ①文化史—中国—宋代—文集 IV. ①K244.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2335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封面设计 王小阳

两宋历史文化丛稿

虞云国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8.5 插页 4 字数 427,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844 - 2/K · 1755

定价 48.00 元

自序

一

尽管电影《高考：1977》只停留在感恩的层面上，反思有欠深刻，但这次高考 1977 毕竟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我既无家学，又无师承，虽然少耽文史，十年内乱却无书可读。“文化大革命”晚期，为配合批儒评法与评论《水浒》两大运动，书禁局部解冻。我当时在中学代课，趁机杂读了一些文史书，但直到考入大学前，根本谈不上专业训练。

我所在的大学并非名校（我常戏称出身三流大学），就读的历史系，当时唯一的中国古代史教授就是程应镠先生。他只给我们上过半学期“中国历史文选”，但在课上曾提及由他主持校点的《宋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说已把宋史定为我系今后的研究方向。这些不经意的言谈，在我的心上漾起了涟漪：对古代文史尽管饶有兴趣，却从未定过主攻方向，何不就选择本系最具空间的宋代史呢？

于是在一次课后，向先生请益如何学宋史。他说，当年听张荫麟先生的宋史课，开出的参考书就是《宋史纪事本末》，你不妨也由此入手；读完以后，可以接着读《宋史》，然后《长编》。我照着去做，除去日语新上手，仍耗大段时间，余下精力几乎都放在读《宋史》上，连上其他课都

捎上一本《宋史》，好在任课教师还算宽容，期末考试也不难对付。大二那年，基本读完《宋史》，为了参加学生学术报告会，就苗刘之变写了一篇幼稚的习作。正式发表却在30年后，而且经过面目全非的增补修改，这就是那篇《苗刘之变的再评价》，也算对初学宋史的往事留痕吧。

接着苗刘之变的研究路径，我发现在其前后的两宋之交兵变尤其频繁，而武将势力也在平定兵变中再度坐大。《从海上之盟到绍兴和议期间的兵变》与《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两文，可以说是入门研究的延展与深入。利用1980年暑假，写出了前者的初稿，长达3万余字。暑假后，将其呈送给先生，内心像有句唐诗说的那样，真想问一句“画眉深浅入时无”？先生只对我说：文章先放在这里，下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我校成立，你可去旁听。他是会议筹备者之一，因有特许，我也许是唯一旁听完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在读本科生。会后不久，先生把论文退我，其上有他字斟句酌的笔削。他让我再誊一份清稿，以便收入论文集。然后，对我的论文，他说了两点：占有史料要全面，但用一条材料能说明的问题，不要再用第二条；写文章要让人爱看，要干净简炼，一句话能说清的，不必说第二句。这两句话，对我醍醐灌顶，终生受用。这是我正式刊出的第一篇宋史论文，我称之为“第一格石级”，并在文末特别注明：“1980年10月8日初稿，时值全国宋史研究会成立；1980年11月7日三稿”，旨在感念扶持我踏上宋史研究第一格石级的受业师。

大学毕业，留校做先生的助手。他正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定稿，让我协助审稿，要求把撰写者提供的参考文献逐一核实，词条释文凡与参考文献有出入抵牾处，不仅必须注明，最好还能考定是非。这项工作历时年余，烦琐而具体，倘若写稿者文献出处罗列不全，尤费搜考之力。但对我而言，整个审稿过程逐渐拓宽了对宋代文献的知识面，也有效训练了对史料考证的基本功。《南宋编年史家陈均事迹考》就是

当年审稿时寻根究底的副产品。

留校两年后，先生招我为宋史方向的研究生。读研期间的专业考察，我选择了由汉中经剑门关入川的线路，重点考察巴蜀境内的宋代遗迹，钓鱼城遗址与大足石刻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当时，大足石刻已引起艺术史界的重视，但宋史学界似乎还不够关注。有感于此，我写了《大足石窟：宋史研究最大的实物史料库》，刊发在当年《宋史研究通讯》与《大足石刻研究通讯》上。另一篇《大足〈懿简公神道碑〉考证》，也是这次考察的意外收获。

我的硕士论文以宋代台谏制度作为研究方向，无论对制度的复原，还是对问题的思考，都投入了全部的心力。尤其后者，把自以为有所寄托的独立之见凝聚在结论之中。遗憾的是，出于某种原因，《结论：分权制衡的失败尝试》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初版本中未能照原稿发表。被删节的部分，后来以《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的思考》为题，作为独立的论文刊出，去年收为增补本附录。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师大开始标校《文献通考》，作为研究生实习课程，我参与其中《四裔考》覆校，任务是复核全部史源出处。这一实践让我在两方面大有获益，一是在文献涉略上更为开阔，一是古籍校勘上初识门径。全书整理完成，岂料却因出版不景气而长期搁置，后虽收入《传世藏书》，但那套书口碑欠佳，大有明珠投暗之憾。2007年，中华书局重新动议出版，但要求再作校理。校书如扫落叶，校勘质量因此更上层楼。重校完工后，我深感中国古代在对待周边民族与外国的观念上，颇有值得反思之处。便进而通读其后三《通考》中的《四裔考》，完成《古代中国人的周边国族观——以〈文献通考〉为中心》长文，从历史角度表达了对开放的中国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人文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末，有出版社准备推出大型系列的《中国文化史大

辞典》，约请程应镠先生主持宋代卷。他已卧病在床，无法工作，便让我具体筹划。接下来的三四年里，我几乎无暇旁顾，按宋代文化的学科框架，设计条目，组织作者，审改稿件。对这一耗时费力的大工程，唯一聊以自慰的，也许是逼着我去了解宋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孰知辞典编定，又以市场原因一搁经年，进入新世纪才起死回生。付印之前，一是把尘封多年的旧稿重加修订，略作补遗；一是撰写一篇卷首的总论，这就是《论宋代文化》，反映了我对宋代文化的总体鸟瞰。

《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交稿不久，我有一个到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访日期间，参加过几次东洋文库的《宋史选举志》研读班，这个班由中岛敏先生主持，柳田节子先生等东京知名的宋史学者几乎都参与其中。作为我的访学教授，丹乔二先生几乎每周一次与我研读探讨日本宋史学家的代表性论著，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也曾是我俩的话题。唐宋之际社会确有较大变迁，就此而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有其敏锐独到之处，但支持其唐宋变革说或宋代近世说的整个内藤中国史观，却脱不开他的时代与立场的烙印。全日本馆藏宋版书最多的静嘉堂文库，也让我流连忘返，在日期间与归国以后先后写过两篇静嘉堂所藏宋籍的论文。

访日归国后，我的宋史研究有点身不由己。先是应约写了《宋帝列传》里的《宋光宗宋宁宗》；再是被拉进一个太湖史课题，负责其中的宋元时期，由此催生了几篇区域研究的论文。

转眼进入新世纪，我的工作集中在三方面。其一，应一家出版社之邀写《细说宋朝》，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因须兼顾与两宋相关的辽夏金蒙史，对当时先后对峙的诸政权关系必须有一个全局观，《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就是为此而作的。其二，以《水浒传》为话头，在一家杂志上写一个关于宋代社会风俗的不定期专栏，

其阶段性成果已编为《水浒乱弹》，无非效颦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运用的材料除去诗文笔记，也包括宋元两代的小说戏剧。于是，我重拾中学时代起对古典文学的嗜好，关于《宫崎市定说水浒》的书评，与此也不无关系。其三，既在体制内讨生活，总得参加集体项目，做了几种《全宋笔记》的校点。我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必须选未经前人标校过的笔记，否则不啻混饭；二是训练研究生做版本调查、诸本对勘与初校试标等前期工作，我最后把关。《南部新书小考》与《校书偶记》，都与校点工作有关：前者是对所校笔记作者生卒与版本源流的考证，后者是几种经手笔记的校勘前言。

这样一路走来，从撰写第一篇宋史论文，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按宋代学者邵雍的元会运世说，三十年为一世。蓦然回首，不由得教人生出隔世之感。

二

既然三十年为一世，也怪不得近年来，上到国家，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活动，下至学界，也纷纷推出 30 年集。我也未能免俗，去年编过一册《学史帚稿》，收录宋史以外的论文；今年这册《两宋历史文化丛稿》，辑集关于宋史的论文。其中《论元代的杨家将杂剧》讨论的虽是元代杂剧，杂剧内容仍是宋代题材。至于《古代中国人的周边国族观》，虽纵贯中国史，却缘起于《文献通考·四裔考》的整理，而且毕竟以《通考》为中心，马端临虽主要生活在元代，其成书也在宋元易代后，但他与胡三省一样，史学精神同属于宋贤史学。

学者自编论集，目的无非两个：一是为人，一是为己。就为人言，奢望自己的一得之见或许还有点参考之处，编辑成书，便人查阅。就为己言，期盼自己的劳作留一点雪泥鸿爪，也是人之常情。但借结集之机，

检讨习史治学的成败得失,对己对人,也许都更有意义。在我的学史过程中,深感有必要协调好三对关系。

其一,断代与通史的关系。记得在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谭其骧先生作为来宾发言,主旨说断代史研究大有可为,只要肯下功夫,中等资质三五年后学必有成。这层意思让我辈中人大受鼓舞。不过,程应镠先生却要求他的研究生,第一年必须通读《资治通鉴》与胡注。我自称已读过《通鉴》,他让我从《史》《汉》一路往下读(惭愧的是,我只读完前四史)。记不清他是否说过“只搞宋史,搞不好宋史”之类的话头,但其良苦用心显然是让我们能以整个中国史的宏阔眼光来审视与定位宋代史。回顾自己的学史过程,基本上是以宋史研究为根据地,然而,因有一定的通史知识作支持意识,一方面对宋史的把握可能更深入真切些,或能避免死守一亩三分断代史自留地的短视与寡闻;一方面也有可能跨越断代史局限,去探索自己偶感兴趣的某个通代性问题,例如我对近代以前中国人所秉持的周边国族观的总体思考。

其二,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老辈学人总是强调文史相通,可惜这一治学传统因学科日趋细化而难以为继。连史料文献还分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前者隶属文学,后者隶属史学。在这种趋势下,史学研究者尤应自觉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其好处,一是可以改变学者无文的偏向,让学术论著不至于味同嚼蜡,多点可读性;二是可以借助史家的视角对文学性史料作出新解读,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家后院的史料库存,以便在研究中拥有长袖善舞多金善贾的更大空间。这一方面,陈寅恪诗文证史堪称范例,令人难以企及。但我结合《水浒传》相关记载,借助诗文小说戏曲等文献史料,勾勒描摹宋元之际的风俗名物,也偶有自得之乐。由于一向关注古典文学,也让我对唐宋变革视野下文学艺术的新走向,对元代杨家将杂剧的故事原型与民众思想,应同道之邀也敢

于妄陈一孔之见。

其三,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毋庸赘言,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石;史料不坚实,史学大厦就无法构建;即便勉强建立起来,最终仍会成为“楼倒了”的。惟其如此,历史学者凭借各种途径与手段,最大限度地拓展与发掘中外新旧的所有史料;通过考证与辨伪,最大可能地复原或逼近历史原貌,这些基本功夫必须老练与过硬。《史料信息化与中古史研究》也许表达了我对这个问题的集中思考,其他几篇考证实例也可视为我在史料问题上的些许努力。然而,所有史料工作,只不过是史家为建构“历史的总体”所做的前期准备。说到底,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的总体”给出解释。在史学研究中,“历史的总体”起着类似自然科学中理论(或规律)的作用;而在解释这种“历史的总体”时,历史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折射出治史者的价值观与现实关怀。在这一方面,虽然做得并不令人满意,但就某些论题而言,我试图在更高层次上给出解释。

并非说,我已经解决了这些关系;而是说,我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做过一定努力而已。至于这种努力是否值得肯定,却不敢过于自信。相反,学习宋史三十年,只辑得三十余篇文章,其中虽或有独得之见,也远不是每一篇都自感惬心的。屈指算来,几乎一年都拿不出一篇精打细磨的像样论文,与前代大师与当今先进相比,只有自愧的份儿。探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学问兴趣泛滥无归。说到底,还是没能把握好断代与通史的内在张力,在其他断代与专题上八面出击,致使宋代史的成果相形见绌。其二,学术定力有所不足。不但缺乏一个宏大而实在的研究规划,作为自己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即便有短期目标,也往往未能断然拒绝与实现目标无关的干扰或诱惑。

回首旧事,始悟往者不可追;展望前路,当知来者犹可规。或许是

可以于己自励，于人共勉的。

三

可以说，除了有关台谏的论文，因专著《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已经涵纳，故不拟收录，这册《丛稿》几乎辑入了我关于宋史的主要论文。至于编排，则以总论性论文开卷，依次为制度与政治研究，文化研究，区域社会研究，史料与典籍研究，再以学术书评殿后。关于宋代的书评，还有好几篇，都是别有感兴的，准备收入将出的随笔集。

论文集基本上按发表时的文本辑录，一般只改正初次刊发时的作者笔误或手民误植，只有关于斯波书评等二三篇文章，恢复了当初删节的部分。这些论文年代跨度长达三十年，分别刊载在不同的书刊杂志上，写作时行文要求各不相同，引文与注释的格式也颇不一致，这次结集，只在每篇论文末尾括注当年揭载的书刊，对措辞行文一般不作改动。刘大立先生在引文核对与注释划一上颇尽心力，为本书减少了讹误，装饰了颜面。

设若没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关注与鼎力相助，也就不会有《两宋历史文化丛稿》的顺利面世。这里，首先应向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为松总编致以由衷的谢忱，感谢他们对我与对上海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关心与支持。老友许仲毅先生作为编辑室主任，百忙之中亲任责编。岁月不居，年华老去，我与他相识相知相交也将近三十年，他为我做责编的这册论集，也堪为见证友情的碑石吧！

作者识于2010年岁杪

目 录

自序

一、总论

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 (3)

古代中国人的周边国族观——以《文献通考·四裔考》

为中心 (23)

胡三省宋史观探微 (61)

论吕思勉的宋史观 (81)

二、制度与政治

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的思考 (103)

从海上之盟到绍兴和议期间的兵变 (118)

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 (166)

苗刘之变的再评价 (183)

三、文化

论宋代文化 (199)

唐宋变革视阈中文学艺术的新走向 (231)

《严先生祠堂记》的宋学意义与文学特色	(309)
给《梦溪笔谈》的评价泼点冷水	(326)
南宋编年史家陈均事迹考	(332)
论元代的杨家将杂剧	(344)

四、区域社会

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	(375)
宋代太湖水利事业述论	(397)
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区域性市场	(421)
略论宋代太湖地区的人文风气与教育事业	(438)

五、史料与典籍

史料信息化与中古史研究——以宋史研究为视角	(457)
大足石窟——宋史研究最大的实物史料库	(465)
大足《懿简公神道碑》考证	(468)
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的始末与真伪	(479)
静嘉堂藏《裔夷谋夏录》考略	(487)
静嘉堂藏罕觐宋籍初读记	(499)
《南部新书》小考	(516)
清小山堂钞本《松垣文集》考述	(522)
校书偶记	(528)

六、书评

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 中心南迁史》	(543)
评《中国移民史》——以辽宋金元时期为中心	(552)
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评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 经济史研究》	(561)
《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读《宫崎市定说水浒》	(574)

总论



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 境内诸政权的互动

黄仁宇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①。证诸辽宋夏金元时期，其言诚是。当然，所谓冲突，也可以赋予更丰富广泛的内涵，断不能只从军事上的征战攻杀去把握，其内涵丰富广泛得多，大体与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说法相近。为论述简便，本文不妨称其为“互动”。

十世纪初叶五代开始(907)，标志着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而再次完成大一统业绩的元世祖是在十三世纪末叶去世的(1294)，因而十至十三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有理由作为历史考察的合适时段。

虽然传统的观点无不认为：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重建，但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分裂与统一都各有一种相对性。宋代确实结束了晚唐五代

^① [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7页。

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所谓中原王朝的意义上（尽管南宋偏安江南，仍可借用这一概念的特定涵义来指称它），消除了分裂，实现了统一。

但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反观这一时期，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分之势，在疆域的大一统方面，不仅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而且辽、金的实控版图不比宋朝小，在与它们的军事角逐中，宋朝基本上没有占过上风。从大中国的视角看，把这一时期看作所谓“后三国”或者“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倘若把视野放宽到大中国的范围内，相对于宋朝说来，辽、金、西夏都已经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之长期抗衡的对等的少数民族王朝（在中古时期，就政权性质、历史跨度、疆域幅员而言，似乎只有北魏与此略相仿佛。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政权大多在历史跨度和疆域幅员上条件不够；西魏、北周与五代后唐在历史跨度上仍有所欠缺；柔然、突厥则政权的稳定性大成问题。）就此而言，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分裂依旧是主流，大一统并未实现，宋朝确乎还称不上大一统的王朝。

然而，无可置疑，宋朝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很显然，大一统最终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来完成的），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的影响上。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相处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只有以这种辩证的观点，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十至十三世纪的历史脉动。